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802010

死亡变奏曲

——布勒特·哈特短篇小说中的死亡主题研究

刘 岩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通过考察布勒特·哈特短篇小说中的死亡形态、主题及其哲学意义,揭示 19 世纪美国西部在“西进运动”“淘金热”等历史时期普世价值观的嬗变,探讨死亡的哲学存在意义,对于社会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指出哈特作品中的死亡观是意识形态下的必然产物,亦是在作者建构下的特殊形式,关注死亡,即关注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布勒特·哈特;死亡主题;普世价值观;历史变革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2-0048-05

死亡作为人类的终极宿命,是难以回避的,而人类对于死亡的看法和感受又是复杂多样的,但死亡并非是简单意义上肉体的消逝,而是富有更高的伦理价值。死亡给予生命以启迪,没有死亡,便没有鲜活生命的多姿。这种相互对立且融合的矛盾体,构成了人类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个母题——生与死。死亡和爱情通常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对于死亡的恐惧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心灵感受。黑格尔曾经将人主体意识的获得视为主人与奴隶之间一场生死搏斗,其中获胜的一方成为主人,通过占有和控制奴隶获取了自我意识;而失败的一方,因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只能选择服从,通过劳动,即对物的占有来实现自我意识。由此可见,死亡对于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至关重要,死亡情节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学家笔下生命哲学的首要主题。作家通过对死亡的书写,审视生命的意义,探讨死亡的进程和形式,以此来揭示普世的价值观,反思人类对于生活的态度及意义。

作家“对死亡的处理则非但重视得多,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足见小说家们觉得死大有文章可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死亡能够干脆巧妙地结束一部小说,从已知写到位置的黑暗比出生的黑暗写到已知更容易掌控。”^{[1]46}而布勒特·哈特作为 19 世纪美国“本土特色”的代表作家,以其

敏锐的眼光、独特的地域意识、积极的心灵感受,在其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大量探讨了死亡主题,通过这一文学书写,来展示美国“西进运动”“淘金热”等重要历史时期美国西部社会的变化以及对于西部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同时彰显美国西部特殊的地域性对于人文环境的影响,揭示了历史变革中美国性的变迁。

一、生命的哀歌

在哈特的眼中,死亡是人类的命运终点,是一生中难以摆脱的羁绊。面对死亡,人类充满了恐惧和无奈,显得软弱无力。心灵和肉体上伤痕累累的人们,面对着自然和社会,孤立无援,虽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但却无法战胜死亡。处于劣势的人们,因无法征服死亡而沦为了自然和社会的牺牲品。

哈特作为 19 世纪美国“本土特色”的代表作家,深深扎根于美国西部,在作品中不仅大量描写了美国西部独特的风土人情,还关注“西进运动”“淘金热”等历史进程给西部带来的影响。亨利·纳什·史密斯在其著作《处女地》中曾写道:“美国内地被表现为一个难以形容的美丽肥沃迷人的新地区。大群大群无主的动物在巨大的森林和丰盛的草原上漫步,从未曾向望人类的手中来维持它们的生活。”^{[2]3}哈特笔下宽广大地上那所

有的丛林、河流、道路、田野、山地以庄严伟大、雄伟绚丽吸引着读者的眼睛,以宏伟响亮震动着读者的耳膜。西部的荒野地带历来被视为美国民众心中的田园梦境。18世纪末开始的美国“西进运动”,主要是指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向西移民的活动和对西部的开发。该运动大大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西部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印第安人被大量屠杀,野生动植物急剧减少,美国西部生活方式亦发生巨大变迁。19世纪开始的“淘金热”则为美国西部带来了大量的移民,东欧的移民、美国东部的穷苦农民、来自大洋彼岸的华人等纷纷聚集于此,面对着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快速变迁的社会,此间的弱者无所适从,沦为了历史进程的牺牲品,在死亡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构成了一曲生命的哀歌。

与其他地域不同,美国西部的移民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时还要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这使得初来乍到的他们面临着残酷的考验。疾病、贫穷、饥饿、社会歧视和不公,移民回到了生命原初: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选择离开的人或许赢得了一线生机,但坚持留下来的人却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哈特笔下的死亡与其他作家的描写相比,少了几分哀怨和悲伤,却多了几分悲壮与平淡。面对着家人和好友的逝去,哈特作品中的人物把悲伤留给自己,擦干眼泪,继续与天、地、人之间的斗争,捍卫人类的价值。“荒野的西部是令人振奋的地区,它充满野外的冒险和同志式的关系。它的英雄们也不带有屈辱阶层的标志。”^{[2]54}如詹姆斯·库珀在其作品《拓荒者》中所描述的一般,哈特继承了西部作品一个重要的主题,“即难以驾驭的西部,无论是因为它地理条件以及生存条件的恶劣,还是因为心理上可能面临的危险,”^{[3]41}西部似乎都不适于人的居住。

在诸多导致死亡的因素中,哈特着重描写了自然灾害和疾病带给人类的威胁,描写了西部美国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坦然和坚强,彰显出西部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哈特的作品展示出“两个与原始主义相关的主题作对立的安排——文明过头的人特有的想要返回自然的颓废的冲动;以及善良的原始人与自然之间的原有的和谐。”^{[4]75}在小说《咆哮营的幸运儿》中,被营地居民收养的孩子“幸运儿汤米”的确带给了咆哮营全新的面貌:“就这样,咆哮营人们的生活开始面貌一新。营

地不知不觉地在变化着。屋子被精心地清洗过,而且粉刷一新。接着还铺上了地板,挂上了窗帘、糊上了壁纸。咆哮营的人们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外表,这也促使他们养成了严格的个人卫生习惯。那些亵渎上帝的话语在营地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人们躺在树下,抽着烟斗,沐浴着夏日黄昏柔和的阳光,陶醉在这美妙的歌声中,认为幸福的田园生活就在他们身边。”^{[5]8}然而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这个营地,1851年冬天的大雪引发了洪灾,“咆哮营的骄傲、希望、欢乐——幸运儿没有了踪影”^{[5]12},最终和营救者肯塔克丧生在洪水之中。哈特在这一故事的描写中,以客观、平和的基调探讨了死亡带给移民们的痛苦和挣扎,描绘其在自然灾害来临时的无助,同时彰显出自然的毁灭之力。哈特并不把这样的死亡视为是人生的悲剧,相反,他笃信《圣经》中的主张——“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4]75}死亡不过是生命进程的一个节点,人人要面对的一个难关。既然无法躲避,就该直面人生,因此故事的结尾将死亡比喻为“无名大海”。

在另一则故事《约翰逊的“老婆子”》当中,主人公居住的环境十分恶劣:那里“事实上,仅是因为常年风吹雨打,草木枯萎,那儿就被清出了一片空地。小屋四周并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几株荒草极力想抹去拓荒者践踏过的脚印,甚至似乎还想永远地埋没它们。小屋周围几码范围内,有片令人恶心的文明地带,堆满了丢弃的衣服、空瓶子和锡罐;四下里荆棘遍布、杂草丛生。”^{[5]220}而屋子里也只是摆放了一张粗糙的桌子,食物少得可怜。女主人公——所谓的约翰逊的“老婆子”,不过是一名将满16岁名叫卡琳的女孩。“女孩儿的脸被太阳晒得根本看不出原来的肤色,却异常坚定、镇静。她脸色憔悴,睫毛似乎还有些林地的味道。”^{[5]224}可怕的瘟疫和饥饿夺走了她的亲人和附近居民的生命,面对死亡,卡琳并没有一蹶不振。她收养了两个孤儿,照料家务、在木材厂帮忙赚取生活费,同时还肩负起四个孩子的教育任务,她的坚强恰恰是对死神最好的回应。面对着大自然,卡琳将死亡视为一种回归,即对于原始生命的回归。她尊重死亡,但也不畏惧死亡;在不可抗拒的死亡力量面前,她挺起了胸膛,用自己的努力赢得生命的意义。

二、生命的赞歌

哈特认为,尽管人类在死亡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但却拥有如何死亡的选择权,必要时能在精神上战胜死亡。既然死亡是人类的必然归宿,那么它便不再是那样的可怕。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地直面死亡,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这恰恰印证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观点:一个人可以被摧毁,却无法被打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于死亡的价值所在,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哈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甘愿牺牲生命来换取精神救赎的人物。这些人物似乎并非如史诗、传奇中那些英雄一般,而仅仅是普通人,甚至有些还被视为匪徒或者恶棍。但不论其身份如何,在死亡来临时,他们都挺身而出,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了自我,以死亡奏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哈特作品中的人物突破了以往西部小说中固有的创作模式。他笔下的英雄不再是与自然为敌手的牛仔,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西部牛仔主人公之所以值得赞扬,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洞察力,而不依靠法律和社会的方式。”^{[3]41}“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即是所谓的气质类型,也称为类型人物,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当其中包含的要素超过一种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条趋向圆形的弧线了。扁平人物都极易辨识,事后也很容易被读者记牢。”^{[1]61-63}哈特作品中不乏一些扁平人物,通常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恶棍、穷苦白人,他们大都秉承了以往漫画式描写的传统,几笔带过,重点突出其某一方面的品质。如斯卡格斯太太的前两任丈夫、矿工巴克的两个投机伙伴、偷盗别人口粮的比利大叔等。这些人物要么邪恶自私、要么浑浑噩噩,只是以一个侧面出现在读者面前。但哈特在作品中主要塑造了大量的“圆形人物”,即集多种情感和品质于一身之人,其表现出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经历和社会经验。“最凶狠的匪徒却长着一张天使拉斐尔的脸庞。”^{[5]12}一部好的作品既需要扁平人物,也需要圆形人物。哈特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多数为扁平人物,并非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文明代言人的形象,要么坚强勇敢,要么温柔大方,要么恶毒可耻,只有少数如密格尔丝一样的圆形人物。反观作品中其他人物,通常来自社会底层,或是被文明放逐

之人,或是本身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如赌徒、恶棍、妓女等。哈特也大量描写了西部特有的人物形象,如矿工、农场主、移民等。在关键时刻,这些社会的“弃儿们”总会牺牲自我,来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理解。

《咆哮营的幸运儿》中的恶棍肯塔克,为了营救汤米,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扑克滩放逐的人们》中的赌徒奥克赫斯特“榜上有名”,被委员会判处了绞刑,为了救助他人,选择了死亡。“曾经是扑克滩放逐的人群中最坚强的、也是最脆弱人,此刻掩埋在雪中,全身冰冷,气息全无,身旁放着一把德林吉步枪,一颗子弹射在他的胸口,样子却和生前一样平静。”^{[5]24}而“泼妇”希普顿妈妈在他人眼中恶毒无比,却在粮食用尽之际,将最后生还的机会留给他人,自己饿死在雪地中。《密格尔丝》中的女主人公本是人们眼中低贱的妓女,为了照顾瘫痪的“活死人”吉姆,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如同莫泊桑作品《羊脂球》的女主人公一样,密格尔丝的高尚宣告了她不光彩历史的终结,展现出一个女性特有的坚强。《五岔口的傻瓜》塑造了赛勒斯这一动人形象。赛勒斯是五岔口居民公认的傻瓜,他定期给一位女士写信,却从未收到过回信;赛勒斯发现了矿穴,但众人却希望他在赌博中输光所有的财产;面对着女教师米利小姐,他真情付出,在她生病时精心照料,却为了营救米利的丈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赛勒斯“在那儿躺了近两个小时,手脚全都砸断了,胸口还压了根粗大的横木……几分钟后,他走了……第二天,大伙儿垒了面墙,把坑道堵了起来,为傻瓜做了个坟墓;但没有立墓碑,大伙儿更加信任,灿烂的阳光里,伫立在山腰上的那座建筑物——那座明亮辉煌的建筑物。任何听说过这件事的人都会说,这里不像其他的纪念物,丝毫没有死亡、忧郁和伤感的迹象,反而是生命、光明和希望的象征。”^{[5]271}

哈特对于爱情的把控张弛有度,因此他笔下不少男性人物是愿意为爱情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的。但对于女性,哈特将其分为了两类,商业化的女性和西部淳朴的女性,构成了文明与荒野之间的斗争。前者通常是从东部而来,在西部尝试运气却失败的女性,为了生存,只能世故圆滑;或是出生在西部,而后被东部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她们多数为利益而生,很少流露真情,靠着欺骗、谎言来赢得社会认可,而他人则成为其圈套下的殉难者。后一种女性则保持了西部原有的边疆精

神,吃苦耐劳,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取生存的机会,淳朴、善良。这种牺牲精神还体现在友情之中,《满潮标》和《湿地中的男人》均讲述了主人公为了信守诺言,珍视友情而牺牲自我的故事。

一部小说的叙事视角大约可分为两类: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外部视角包括主人公的视角、重要配角的视角、不同角色的视角和通过书信呈现的视角;内部视角包括全能全知的视角、相对受限的视角和严格受到限制的视角^{[1]193}。哈特则选取了第三人的视角,或不同角色的视角来讲述其故事,更为客观地将西部特有的文化、历史与死亡观结合起来,既谴责了西部开发进程中的文化入侵,又批判了淳朴的民族性和美国性的丧失,将人世间美好的事物加以大力颂扬。

三、生命中的不和谐音符

“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下的产物。西方人以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而东方既不是欧洲纯粹虚构或想象的产物,也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东方主义”被视为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视角为的是彰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掌握其话语权。在长久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东方成了异质的他者,甚至是西方的对立面。文化霸权的存在使得东方招来了敌视,成了异域^[6]。

19世纪,随着太平洋铁路的开发和“淘金热”浪潮,大批华裔移民来到美国西部。他们不论在生活,还是文化上都遭受了种族歧视,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劳工潮进入美国,美国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引发反华浪潮,美国政府最后颁布遏止中国人进入美国的《排华法案》^[7]。1870年,哈特发表了一首幽默诗《异教徒中国佬》,获得了读者的追捧,而后在《卡里东的阿特兰达》《阿新》等诗歌中,哈特还创造了华人形象“阿新”。阿新被描述为一个鬼机灵、大骗子、赌钱作弊、胆小怕事的华人劳工。但哈特自身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很难说他就是种族分子,但其创作的诗歌却能真实反映出19世纪美国社会对于华人的不公。不仅如此,哈特在其短篇小说中也就华人形象进行了描写,以平实的语调叙述了19世纪美国社会对于华人的看法和华人的遭遇。作品中的华人道

德上并非完美之人,但其悲惨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不已。

《斯卡格斯的太太》中的“中国佬”阿福,“在去萨克拉门托的路上,曾两次被一个机灵的白人醉鬼,戏耍般地由驿车顶部扔了下去……在唐镇,被一个陌生人狠狠地揍了一顿——纯粹是个基督徒额外努力工作的行为。”^{[5]336}阿福被描述为一个盗贼、专爱小偷小摸;他还十分狡诈、虚伪;经常被警察冤枉、毒打。与阿福相比,《异教徒李顽》中华人李顽的死亡更加具有说服力。李顽的出现颇具戏剧性,他是一场魔术表演的产物,本就是无足轻重之物,这也预示了其生命的荒诞性和灾难性。李顽随后成了一名学徒,但却被认为是玩忽职守,态度恶劣。李顽本该接受自己灾难的一生,但在印刷间里,李顽“表现出惊人的理解力和适应力。”^{[5]148}于是白人愤怒了,开始怀疑李顽有政治企图,咒骂他为魔鬼的野种,黄种小混蛋。哈特认为李顽是“一个道德观念从未被唤醒的小顽童,不知道信仰什么,却十分迷信……他生活在满是欺骗和诡计的环境里,早就学会了自欺欺人。”^{[5]150}但李顽却是天真、善良的,喜欢知恩图报,也渐渐地学会了礼仪,但“1869年是个多事之秋,有那么两天永远被记入了旧金山的史册——那两天一群暴徒袭击并杀害了手无寸铁、丧失了防御能力的外国侨民,就因为那些人是外国人,跟他们的种族、信仰、肤色都不同;对于工作,不论薪水多低,都有人愿意干。”^{[5]154}李顽的生命就这样被暴徒夺去了,在他生命价值显现之前,就沦为了种族歧视的牺牲品。这样的死亡方式毫无意义,令人扼腕叹息。哈特一面真实地反映出19世纪美国西部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面又充满矛盾地同情着外国侨民。死亡在这时变得面目狰狞,丑陋无比。

四、结语

哈特对于人类永恒的死亡主题的思索和对生命最终价值的追求,已经融入了美国的精神与文化之中,促使人们从更为深刻的层面和更加宽广的视阈来审视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给后人以生命的启迪。而那些直面死亡、坦然处之、自我救赎的精神也激励着世人勇于去实现自我价值,而种族主义等社会问题下的死亡则令读者痛定思痛,激励世人为和谐世界的建立大声疾呼。

参考文献:

- [1] 本·弗斯特. 小说面面观[M]. 朱乃长,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2] 亨利·纳什·史密斯. 处女地[M]. 薛蕃康, 费翰章,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3] 陈许. 美国西部小说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1.
- [4] 中国基督教两会. 圣经[M]. 北京: 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社, 2008: 5.
- [5] 布勒特·哈特. 咆哮营的幸运儿[M]. 刘岩, 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
- [6] 爱德华·W·赛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9: 61-120.
- [7] 赵毅衡. 诗神远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7.

The Study of Death Theme in Bret Harte's Short Stories

LIU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exist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death theme in Bret Harte's short stories, disclos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value in the American Wes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Movement" and "the Gold Rush", which discusses its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system and behavior, to point out that death theme is the product of both ideology and writer's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of death correctly benefi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Keywords: Bret Harte; death theme; value; the historical changes

(责任编辑: 沈建新)

(上接第 23 页)

Earth-unbound Acquaintance Society: 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of The Problem of Water Conservancy Disorder in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Conservancy Disputes

WU Jinf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rural society has changed greatly and the traditional acquaintance society disintegrated obviously. The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current social order changes in rural areas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disputes of Jang village in Chaohu Lake.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rural village of the traditional period, under the water resource stress, farmers use various strategies to compete water, such as identity exclusion, family union, convincing people by reasoning. Disputes over water conservancy happened frequently. But earth-bound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 Confucian order can punish offenders timely, correct and restore the water conservancy ord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mobi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farmers decreased water disputes, but also with the disorder of rur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reason is that population outflow, people-earth connection weakening,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degradation of earth-bound acquaintance society for earth-unbound acquaintance societ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order can't jus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 from the rural population flow, land system, and society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by closely relating to the background of earth-unbound acquaintance society.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disputes; village; acquaintance society; earth-unbound acquaintance society

(责任编辑: 沈建新)